

■新作聚焦

徐贵祥长篇小说《马上天下》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饶翔

“军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型,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左传》《史记》《战国策》留下了大量战争叙事的典范之作,后世则衍生为蔚为壮观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尤其是《三国演义》,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及至当代的“红色经典”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仍然是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呼应,其间,新的历史观与民间美学趣味的融合,使军事文学焕发出勃勃生机。新时期以来,军事题材创作也参与构筑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辉煌。然而,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潮,当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已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甚至颠覆了宏大叙事与英雄主义,军事文学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便不言而喻了。因而,近些年军事题材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再度红火,无疑联系着深广的文化背景。都梁的《亮剑》与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军事题材创作在新世纪的文学出版、影视改编与评奖等多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它们见证着革命资源重新被启用,也喻示了新的主流价值的重建。这些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主流历史叙述与大众趣味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与结合,给我们以可供探讨的经验启示。

徐贵祥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推出新作《马上天下》(《当代》2009年第6期,2010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继续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小说通过共产党指挥官陈秋石跌宕起伏的军事生涯,来呈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隅。与作者此前的创作一样,这部小说也充满

了令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的战争描写、战术分析与战例讲解,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知识的丰富与积累的厚实,小说的内容肌理因而而显得相当结实饱满,具有了如生动的军事教科书般的品质,吸引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作者无疑在提高军事文学的可读性上下了功夫,并获得了相应的成功。对宏大战争场面的铺排调度,对交战双方战前战中战后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的描写,对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拨云见日的战局的叙述,可见作者把握战争题材的杰出能力。

小说的叙事简洁有力,秉承史传所开创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小说中少有静态的描摹,而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在事件的发展中去呈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小说在陈秋石与其离散的妻儿各自的经历遭遇之间,不断交错地推进叙事,而后又加入以章林坡、杨邑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叙事线索繁而不乱,在历时性叙述中不断穿插倒叙、补叙、预叙,从而使叙事富于节奏变化。小说在此留下了诸多可堪玩味之处,比如第四章的结尾,陈秋石身边的两位革命女性袁春梅与梁楚韵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冲突,愤怒之下,袁春梅拔出了枪,“话音未落,就听一声枪响,梁楚韵当场倒在地上”。本章在这句结束语中戛然而止。当读者带着关切之情转向第五章,又读到这样的开场:“枪声骤然响起”。接着往下读,才发现此枪声非彼枪声。此处的枪声是陈秋石失散的儿子、共产党的游击队员陈三川发出的,而倒下的则是国民党教官李万方。小说便顺势过渡到国共双方围绕枪击

事件所展开的明争暗斗,并补述了陈三川与李万方此前的过节。直到本章的第五节,才又重新转回到对袁春梅枪击的后续交待。原来袁放出的那一枪只是打到梁楚韵脚下,然而她的鲁莽,却让她的上级赵子明起了戒心,将她调入陈三川所在的部队,并接手了为身陷囹圄的陈三川辩护的重任,两条叙事线索在此很自然地合二为一,不断将叙事推向高潮。

小说可读性的提升还有赖于作者对于“传奇性”的追求,正如唐代的文言小说就叫做“传奇”,传奇性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特征,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对于徐贵祥的滋养由此可见一斑。《马上天下》将“寻父”这一传统文学母题搬演到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陈秋石因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而抛下妻儿,而妻子蔡菊花和儿子陈三川为了逃避土匪的劫杀,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又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伍。父子二人咫尺天涯,虽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并肩战斗,却相见不相识。小说便在这样的戏剧张力中向前发展,直到结尾战斗结束,父子相认,在经过一个大循环之后,叙事归于圆满。

小说的传奇性还体现在对陈秋石这一传奇人物的塑造。陈秋石可谓是“战术之神”,而他在战术上的卓越智力仿佛是天赋禀稟,使他刚进入黄埔军校南湖分校学习不久便崭露头角,深受教官杨邑的赏识,在进入实战阶段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如有神助。孔雀岭守卫战不过是牛刀小试,其后所经历的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如苍南之战,临城反扫荡,嵩山高地战役,官亭埠战役,西黄集战斗等等,及至最后的

■第一感受

说真话 显真心

□吴福辉

人,都已经不是泛泛之论,而是能够搔到这些名家的痛痒。杂和专的统一的印象,就这样给我留下了。

本书题为《批评的风骨》,世上“风骨”的体现依我看是各种各样的。世琦的文风并非臧否人物、敢怒敢言的那种。他的书评很少有一语惊人、振聋发聩的文字,也无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说大话,说极端话,动辄翻案、颠覆,假冒“敢为天下先”的那种作风。而是坦诚直言,纵论世情,属于巴金提倡的“说真话”类型。看他议论有关鲁迅的书,分析鲁迅的自选集为何自己选落《狂人日记》《祝福》的道理,说到曹聚仁《鲁迅评传》一书论及鲁迅少虚伪、多箴言,与当时大陆的一味歌颂相区别,都很能切中要害。

如果把全书一口气读下来,你会觉得在作者心目中自己是一个散文作者,他也确乎对散文目得最为透彻。而在散文方面谈论得最见功夫的,当数他极力称赞顾随在《谈庵文话》中使用“诗心”概念,来破天荒评价曹丕的散文成就一事(因为历来都把曹氏父子文学地位的末把交给给予曹丕的,论的又是曹丕的文学批评成就)。所谓“诗心”,尽管可以包含我们日常常谈的“情感热烈”、“感觉敏锐”诸要点,但顾随更强调的是“一要恬静

渡江战役,陈秋石高超的战术本领被操练演绎得愈发出神入化。得益于在新式学堂和军校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陈秋石具备了现代军人的素养和品格,他认为在告别冷兵器时代之后,单靠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有勇无谋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提高“泥腿子”军队的文化和军事水平。虽然遭到抵制和批判,靠写思想检查“过关”,但他并未放弃将一只传统部队引上现代之路的努力,他在将儿子陈三川从一个草莽英雄培养为现代军人方面,也是煞费苦心。这个人物的现代品格还表现在,与对战术智力的沉迷相伴或相悖的,是对战争的疏离以及对战争本质的终极思考。这使得“战术之神”并未异化为一台战争机器。我们常常能感到他对战争的犹疑与逃避,“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学会了打仗”。

然而,这一人物又绝非纯然“现代”的。这个乡村财主的后人,在16岁以前,“一度认为自己是贾宝玉或者梁山伯,至少也是张生”。这种传统文人趣味一直延续下来,在其婚恋中呈现得最为清晰。他观看女性的目光透过了一双欲望之眼,无论是对前妻袁冬梅还是后来的“革命伴侣”袁春梅。而他阴差阳错地参加革命队伍,也多半是因为女性的吸引,因为性动力的驱使。在爱情受挫之后,他才将力比多“升华”为一系列的军事杰作,“移情”为对遭他遗弃的妻儿的忏悔与思恋,并以此一再拒绝梁楚韵的追求。我以为,这样的处理是值得商榷的,作者在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向世俗“还原”的同时,却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说,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英雄人物的“成长”,与他们行动的能力的提高相伴相随的,是他们不断被激发的革命热忱和日益坚定的革命信仰,那么,在《马上天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陈秋石的“成长”,感受不到他是如何从一个“稀里糊涂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共产党军官的。除却仿佛与生俱来、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并在战争中日臻完美的军事指挥水平,除却因一次感情重挫而发生的精神突变,我们感受不到多少人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人物形象于是失于单薄、单调,而缺乏性格的厚度与历史的深度。这也是我在阅读这部多方面表现优异的作品时感到的不满足之处。但或许,这也为作者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掘、不断提升留下了空间。

(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容。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活泼泼的。感觉敏锐固能使诗心活泼泼地,而又必须恬静宽容才能使‘心’转‘物’成诗。”这样,“诗心”就被醒目地加入了“理智”的要素。然后拿来评价曹丕,顾随即大胆指出:“中国散文中家,古今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敏锐而情感又如此热烈者,魏文帝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养。”世琦细致挑拣出顾随别出心裁的“诗心”理论,来介绍顾随关于曹丕散文的非同凡响的看法,不妨说,他真也是一颗“散文心”的。

“散文心”算得是我的杜撰。“散文心”应以“诗心”为底,感情、感觉、想象应当一样不缺少。可能不如诗思那么敏锐、充沛,不那么气势磅礴,但恬静、宽容的标准应当比诗更过之无不及。又因散文的体式是反虚构的,是要将“真我”植入的,“散文心”就应该更真实、更自重,更轻烟般散淡,更讲究气韵生动。我在世琦的书里读到谈范用、谢大光等编辑家的文字时,尤其感到作者的那颗“散文心”。范用了解每一本书的性格,把它们摩挲着编辑出来,书写出来,仿佛是作者在用“散文”探过着编辑活动的微妙精细处。谈谢大光,因是同事的编辑阔家,如同夫子自道。谢大光的编辑视野开阔,对外散文家有独特的美感爱好,著名家却不避有前途的无名小家,随时学习丰富自己,感深兼发,凝结成文,是一个学者型、出版家兼散文家。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世琦自己吗?

《山月》照亮京西山村

□张同吾

北京西山以西的门头沟,层叠叠嶂、山路崎岖,林木幽深,经历了太久的苍凉和贫困。那里出煤,挖掘出地下的阳光,山民们破败的小屋里依然黑暗。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他们挺直了腰板,却没有找到通往富裕的道路,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这片苍茫古老的山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才才开发了巨大的潜能,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以神奇的速度走向繁荣安康和富裕。这里已成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尘封百年的明清古建筑,精雕细镂的精湛工艺,像又一座庞贝古城呈现在群山环抱之中。清冽的山泉、奇丽的山景、鲜美的山珍、奇异的佳肴,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这里被誉为北京的后花园。

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诗人马淑琴出生于斯长于斯,她见证和体验了山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史进程。她喜爱泰戈尔的一句诗:“对我的心,最好的芬芳馥郁的礼物,来自这土地上的花朵,我不知道还有何处的月光,能以这样的美丽洒满我的身心。”于是,她用三个半月的时光,遍访13个山村,创作出沐浴着安详和谐时代之光的长诗《山月》。

一般来讲,优秀的叙事长诗不仅需要宏大的艺术框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而且需要有灵动的诗性叙述,从而体现诗所独有的审美功能,不是纯实的描绘,不是空泛的说教,也不是平庸的抒情,而是在意象群落中含融情思的流动。《山月》是一部含有叙事成份的抒情长诗,就像山村巨变的画卷,却不是精雕细镂的工笔描绘,而是充满浪漫色彩的意笔涂染。画卷的亮点是山云、粮食、菊姐、菊妹四位致富的带头人,他们有不同的的人生苦难,不同的性格特征,却有共同的命运归宿。马淑琴是位懂得诗歌真谛的诗人,她把人物置于时代光环之下,才映照出性格风采,才展现出生气勃勃的生活画面。党的富民政策激活了人的心志,他们看到“山峦从东方伸出大手/捧出燃烧的旭日/苍翠的山林/用

■言 论

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文坛法宝,我们的作家俨然已经习惯了用咬牙切齿的批判方式表达着对于现实的关怀。当然,关怀与批判理应是一致的,换个说法,即无心指向关怀的批判一定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就此审视一下我们那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是很有些言不由衷的。火力十足的批判冲动与口头上的关怀简直一点儿都搭不上边,否则的话,他们怎么又总会有那么多难以抑制的激愤情绪呢?如果心里想的始终是关怀,批判的动作又怎么能那么的缺少柔情呢?似乎一向便是如此,严肃总是多了一些,幽默总是少了一些;揭露总是多了一些,包容总是少了一些。更为可怕的是,久而久之,他们自以为拥有的幽默和包容能力也就不知不觉地随之丧失了。就像我们始终是在把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奉为正宗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最后竟将他们同样丰盈的浪漫主义情怀给遗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只记住了他们的寒冷,以至于完全否认了他们温暖的本质。

没错,严肃是必须的,揭露也是必须的,但幽默和包容同样也是必须的。不然,严肃与揭露就该往赤裸裸的暴力伤害那个方面堕落了。若如此,写作的意义又该在哪里呢?难道写作的本质不是一种蕴藉着爱、信仰以及希望的关怀吗?因此,那些从来就不给人以希望的写作该有多么的虚伪和做作呀!由此说来,我个人的写作也便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健康了。同那些热衷于批判和揭露现实的作家一样,我的写作对于现实也不是一个给予的过程。所谓的批判和揭露在相当程度上亦无非只是一种剥夺的行径,即将现实尽可能地剥夺到赤裸裸的地步。其中除了粗暴,没有任何的智慧可言。事实上,我也向来鄙视此种动辄企图令现实赤裸化的写作,认为它与色情行为实无两样,释放的皆不过是人难以正视的某种阴暗欲望罢了。这也就是揭露与暴露之间的天壤之别吧,揭露期待的是真相,其本身是一个为正义和勇气所驱使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创建和丰富;而暴露则同真相无干,因为它所指向的从来就不是刻意的伪装,乃仅仅是要挑战人类固有的羞感与畏感,别有用心地想把那些本来就该待在暗处的事物统统公开化。但是,它意在追求的却又绝非光明,光明之于它不过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已,其真正怀有兴趣的永远还是光明背后的那些东西。而将那些东西置于光明之中,又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拯救它们,故即便只是对于光明的可耻蔑淡了。除此之外,它不会有何建树;正像如今那些泛滥的反腐之类的“黑幕小说”,它们非但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因此得以净化,反倒只能属于趣味越黑式的添乱,也恰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号称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电视剧《蜗居》热播之后,我毫不惊讶于听到一位女博士针对该剧的第一焦虑反应是:“我好想被人包养啊!”为何我们暴露现实得来的却是如此一个怪不知耻的恶果?那正是因为我们暴露本身的一个动机不是源自一种求真向善的无畏,而是源自一种哗众取宠的无耻。

高贵的古希腊诗人品达说:“一个人最应该描写的是那些美和善的东西。”而由于我们严重匮乏这样高贵的写作境界,结果,便无可避免地将一种色情主义的垃圾当成现实主义的精华了。暴露即色情,其指归是取悦人们的眼球,而非涤荡人们的心灵;这么一种写作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学性?文学是回忆,回忆是诗,诗是创造。然而我们今天的写作却依然格外执迷于当下、执迷于破坏。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就失却了文学性的文学现场。那么,要想坚守住我们曾经的文学理想,我们的最佳选择也许还是坚守在这一现场之外吧。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可能恰恰是我们过去那种积极的介入姿态,致使我们的写作日渐偏离了应有的正道。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酷爱窥视的年代,尤需格外小心才是。我们可以不是一个作家,也可以不是一个学者,但绝不可以不是一个

基于此,我想,现在我们的文坛迫切需要的既不是什么作家,也非什么学者,而是真正懂得如何热爱文学的人。

徒弟老那《小三通》 阳光不会因为照耀的地方太大而减少温暖

爱情婚姻是文学的母题,不同的时代都被反复书写。可能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情感像近三十年来这样剧烈而复杂地动荡过。《小三通》(《文学界》2009年第12期)里的幼儿园老师虹、蔓、英,与单位分配来的三个大学生“娃娃”、“高”、“黑”先后分别相恋、结婚。虹最先结婚也最先发现“娃娃”有了外遇。“高”下海后迅速发迹,并在外面也有了女人和孩子。“英”认为自己的丈夫“黑”既花心不顺,也没有财富,是个窝囊废。意外的是,“黑”在外面有个女人“徐萍”,还有个女儿。作品微妙地描写了三个姐妹从浪漫的女孩到家庭主妇的成熟、承担过程以及相互之间的友情。虹的精明、强势注定了她采取不惜一切的方式,最终让徐萍顺畅的“娃娃”以支边的方式逃到了千里之外。蔓的隐忍和宽厚决定了她只能默认“高”提出的“小三通”,即两个家、两个孩子、两个人互通有无,英的生死观、恬淡表现在她没有像“虹”那样发动一场生死大战,她也没有如徐萍所期望的一起去阻止“黑”的调动,她甚至都没有质问“黑”。但是“英”逐渐发现两个孩子从秘密联络变成了公开来往,两个女人也自然地把自己什么东西都准备了两份。“英”突然明白,爱就像阳光,温暖的人越多这个世界就越暖和。在情感婚姻的变化中,无疑总会捍卫什么或伪饰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凿的,每个当事人都需要大爱,而且每个当事人决不会因为这一爱的选择和付出而减少了自己得到的爱。(李鲁平)

本版责编:刘 颖 刘秀娟

■短评

笔端托意抒乡情

□纪红建

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她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遗传信息,可以启迪与发现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路径,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作家邓建华二十多年来,始终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融入社会,又以一个作家的眼光观察人的命运变迁和时代的风云流转,以笔托意抒乡情,且创作势头始终强劲。他无疑是这个时代乡土文化优秀的记录者和传承者。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成立的湖南有名的农民文学社团——无名星文学社,还是90年代的系列小说《黑狗坡的左邻右舍》,再到新世纪的《床前明月》《乡村候鸟》《岔道》等,邓建华的大批植根乡土抒写乡情的小说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始终强劲的创作势头源于对文学的特别挚爱。二十多年来,邓建华虽然经历较多岗位,但他的创作势头越来越强劲,从创办文学社,到写系列小说,再到精心打造长篇小说,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持之以恒的创作意志,体现了邓建华对文学的极度热爱。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热爱,才会把文学创作上升到自觉高度,只有这样作家对社会发展才会怀有深邃之思,对文学创作怀有深重之责。基于此,邓建华才收获了《床前明月》《乡村候鸟》《岔道》等近十部颇受欢迎的作品。

邓建华之所以连绵不断地推出新故事,这得益于他独特的乡情。邓建华一直在基层工作,又出身农村,加之他总是做“有心人”,走到哪都留心 and 记录,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传说等素材。无论是系列小说《黑狗坡的左邻右舍》,还是《乡村候鸟》《岔道》等长篇小说,在读者中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它们原汁原味的,读起来亲切感人,其中还散发着浓郁的地域风情,朴实的群众语言,风趣的情节让人过目不忘,自然被读者津津乐道。正是这股纯真的乡情的张力和感染力,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读者。

邓建华对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他的小说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饱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思考。这与他对于乡土文化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邓建华的笔下,有农村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形形色色的老百姓,有外出打工、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有乡镇和县级以上干部和职工……实际上,这些人物组合起来就是邓建华描绘的一幅栩栩如生的乡土画卷。《乡村候鸟》便是他对乡土文化深刻理解的典型代表。城市的迅猛扩大和拓展,吸引了无数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蜂拥而入,这个全世界都罕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梦想贯穿了城市和乡村。邓建华通过自己对时事和政治的远见,用充满悬念的细节,创作了湖南首部以农民工返乡创业富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创作和出版之时,正值金融风暴席卷之时,作品的社会意义油然而现。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

□路文彬